

古文字研究

啓功



古 文 字 研 究

(第 二 辑)

中华书局编辑部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水利电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10 3/4 印张

1981 年 1 月第一版 1981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9018 • 103 定价: 1.50 元

目錄

唐兰同志遺像

悼詞

紀念唐立厂先生

水調歌頭

參加五屆政協喜賦七律一首

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

上編 昭王時代青銅器銘五十三篇的考釋

下編 昭王時代青銅器銘五十三篇的綜合研究

圖版

朱德熙

唐兰

唐兰

唐兰

唐兰

唐兰

唐兰

目錄

同志们：

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中國古文字學術研究會理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研究員唐蘭同志和我們永別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十二時十分，唐蘭同志心臟驟然停止跳動，經醫院多方搶救無效，終年七十九歲。

唐蘭同志是浙江省嘉興縣人。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三年就讀於江蘇省錫鬯中學，修館，為以後從事學術研究奠定了基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四八年間，唐蘭同志歷任東北大學、師範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中國大學、西南聯大、北京大學等院校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代理中文系主任，故宮博物院設計員、研究員、學術委員會主任、陳列部主任、美術史部主任、副院長等職。一九五九年被選為北京市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一九七八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唐蘭同志是我國著名文字學家。他在二十年代就精研《說文》、《爾雅》等典籍，三十年代著有《古文字學導論》、《中國文字學》等書，對古文字學的研究造詣很深，貢獻很大，最近又提出了文字學規劃的初步設想。唐蘭同志終生致力於文字改革，矢志為中國文字現代化而努力。一九七八年病重期間，仍然不忘這項工作，他打算在國慶三十週年之前完成新文字拼音方案向党獻禮。

悼

詞

悼 詞

唐蘭同志是我國著名金石學家。早年從事甲骨文研究，有《殷虛文字記》、《天壤閣甲骨文存攷釋》等著作，見解精辟。數十年來，他還對出土重要青銅器的銘文攷證和斷代做出了卓越貢獻。

唐蘭同志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對我國古代史有獨創的見解。四十年代他專門研究過戰國文字和戰國史；建國後他積極學習馬列主義，並運用馬列主義觀點對中國古代史分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近年來唐蘭同志提出的大汶口文化已進入了文明社會的重要論點，在國內外引起了普遍的重視。一九七四年以來，唐蘭同志參加了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發表了關於《黃帝四經》、《戰國縱橫家書》、《春秋事語》等論文，做出了卓越成績。

唐蘭同志還精通書法篆刻藝術，又是詩人，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到天安門廣場悼念敬愛的周恩來，事後賦詩近百首。毛主席逝世後，他深切懷念，賦詩百餘首，表達了唐蘭同志對毛主席、周恩來的無限深厚感情。

唐蘭同志治學勇于創新，敢于沖出框框，努力把考古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提出了不少新觀點、新看法，有助於學術討論與活躍學術空氣。唐蘭同志對學術上的不同觀點能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開誠佈公，心平氣和地進行探討。

唐蘭同志在故宮博物院工作，長期擔任主要業務部門的領導職務，並開展學術活動、培養接班人和業務骨干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績。

唐蘭同志在黨的領導下，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真改造世界觀，他熱愛新社會、熱愛毛主席。一九五九年被評為北京市先進工作者。

唐蘭同志積極參加歷次政治運動，立場堅定。粉碎「四人幫」之後，他多次表示要

把林彪、「四人幫」十條破壞壞廢了的時間補回來，日以繼夜地從事寫作，近幾年發表了政論與探討的論文二十多篇。一九七八年四月唐蘭同志以七十八歲高齡隨出土文物展覽赴香港，同香港學界，進行了頻繁的接觸與學術交流。以後不久即患重病，病體剛有好轉，唐蘭同志即投入了撰寫工作。《西周青銅器銘文史徵》是唐蘭同志規劃項目之一，全書三卷計函二〇萬字，上卷已寫完了初稿，正當我們殷切期望這部巨著提前問世時，唐蘭同志不幸與世長辭。

唐蘭同志的逝世是我國學術界一大損失，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優秀學者、好同志、好老師。

我們要學習他對黨、對人民、對革命一貫忠誠的優良品質。

我們要學習他堅強的革命事業心，勤、懇的工作，風，勤奮治學的刻苦精神，堅持真理的嚴肅態度，深入淺出的良好文風。

我們要學習他不計待遇、不計報酬、不計較個人得失、平易近人、海人不倦的高尚風格。

我們要學習他活到老、學到老，一直戰鬥到最後一息的革命精神。

三十年来，唐蘭同志積極要求進步，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多次提出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最近再一次提出入黨申請，并表示即使生前不能入黨，死後也希望成為黨員。根據唐蘭同志的一貫表現和生前願望，故宮博物院黨委決定，追認唐蘭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在悼念唐蘭同志的時候，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緊密地團結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周圍，為在本世紀內實現四個現代化而努力奮鬥！唐蘭同志安息吧！

紀念唐立厂先生

朱德熙

立厂先生是我治古文字學的啟蒙老師。抗戰期間，我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上學。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連續聽先生的課。當時聯大中文系最叫座的教授是聞一多先生和羅庸先生。尤其是一多先生，他講楚辭，連教室外邊都圍滿了人。聽課的人裏很多是慕名而來的外系同學和校外人士。立厂先生的課遠沒有這麼「熱鬧」，但是在學生裏「威信」很高。有的同學只是先生開的課一律都聽，我便是其中的一個。

先生在聯大時期開過的課很多，我記得的有：《六國銅器》、《甲骨文字》、《古文字學》、《說文解字》、《爾雅》、《戰國策》。此外還開過一學期宋詞。先生上課從來不帶講稿，其實他根本就沒有講稿。上《說文》的時候，手裏舒一本《說文詁林》。或是示學彙函、石印小字本《說文解字》，一頁一頁順着翻下去，碰到他認為應該提出來講的字就停下來講。講的內容與《詁林》沒有多少牽涉，大都是先生自己的見解。講《爾雅》也是如此，不過手裏舒的不是《說文詁林》，而是邵晉涵《爾雅正義》一類的書。因為沒有講稿，完全是即興的話，就象平常聊天，所以聽課的人覺得特別親切。聽先生的課不但可以了解先生的學術見解，而且還可以看出先生治學的方法、態度和風格。所以很多同學愛上先生的課。用今天的眼光看，上課沒有講稿，甚至根本不怎麼備課，似乎不足為訓。不過評價大學裏的專門課程，首先要看學術水平，教學方法還是次要的。這些年來過分強調教學方法，這對學生來說是遷就，對教師來說則是苛求，恐怕

獎多利少。

說到先生的課，我又想起了一件事。當年在聯大聽先生課的，除了中文系同學之外，還有兩位教授。一位是物理系的王竹溪先生，另一位是哲學系的沈有鼎先生。我記得王先生聽的是《說文》，沈先生聽的什麼課我不記得了。不過沈先生是聯大有名的不修邊幅的人。他滿臉鬍子茬兒，光腳穿一雙又舊又破的布鞋走進教室的樣子至今猶歷歷在目。當時昆明物價飛漲，教授生活十分清苦。加上日本飛機轟炸，三天兩頭跑警報。就在這樣的環境裏，王、沈兩位先生居然有閒情逸致跑到中文系來聽立厂先生講古文字學。這件事很能說明當時聯大學術空氣之濃厚。聯大前後辦了八年，師生顛沛流離，生活十分艱苦。可是在茅草棚的教室裏竟然培養出不少國內外知名的學者。我想這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外來的干擾少，第二是教授陣容強，第三就是有濃厚的學術空氣。

立厂先生興趣廣泛，知識淵博，他做過很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不過致力最久、貢獻最大的還是古文字學。先生不僅考釋出很多難識的字，而且在方法論上也有重要的貢獻。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研究古文字是一件時髦的事，考釋甲骨金文的文章發表得很多。不過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沒有多少根據的胡猜。在甲骨方面發表過不少論著的葉玉森自己就承認考釋甲骨文字猶如「射覆」。立厂先生寫《古文字學導論》就是為了推陷廓清這種不科學的學風，力圖把古文字的研究建立在扎實的科學基礎上。他在書中提出了偏旁分析和歷史考證兩種方法，并說：

偏旁分析法研究橫的部分，歷史考證法研究縱的部分，這兩種方法是古文字研究裏的最重要的部分。

一個古文字往往跟同時期的其它文字在形體上有聯繫，研究這種聯繫就是偏旁分析。另外一方面，一個古文字的形體必然跟這個字較早的寫法和較晚的寫法有聯繫，研究這種聯繫就是歷史的考證。盡管這兩種方法在具體考釋古文字時都曾有人用過，但先生第一個有意識地把這兩種方法作為方法論的原則提出來，意義是重大的。

自來研究漢字歷史的人都擺脫不了傳統的六書說的束縛。由於六書說實際上是漢朝人的文字理論，並不能如實地反映上古漢字的構造系統。不過在甲骨文字發現以前要想冲破六書說的藩籬是不可能的。先生生於甲骨文字發現之年（一九〇〇）^{注一}，二十年代開始研究甲骨，在全面分析了上古漢字的構造和演化之後，終於批判了六書說，提出了古文字事實上只有象形、象意、形聲三類的新說，用今天的眼光看，先生的文字理論可能還不够完備，但在當時不能不說是重大的突破。

立厂先生受的是傳統教育，可是他完全沒有舊時學者那種狹隘、保守的氣味。從先生的著作以及他的治學方法裏可以看出，他思想開明，而且富有近代科學精神。我覺得先生在學術上有那麼高的成就恐怕跟這一點也有密切的關係。

先生所以能有開明的思想和科學精神，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博覽群書。他不僅讀古書，也讀現代人寫的書，而且還讀過大量的翻譯作品^{注二}。說到這裏，我不禁想起先生兩次學外語的情形。第一次是在昆明自學英語，已經達到能看書的程度。那時候昆明滿街都是專供美國大兵看的袖珍本英文書。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他花了很大的勁搜齊了一套（大概有好幾百本）。第二次是解放初，那時先生已經是五十多歲了，又開始自學俄語，據說也到了能看書的程度。

立厂先生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我從來沒有見他為什麼事情發過愁。他那爽朗、

縱情的哈哈大笑有一種感染力，能讓心裏有什麼鬱抑事兒的人跟他一起快活起來。抗戰時期生活很艱苦，先生仍然自得其樂。授課和著述之餘，有時還跑來跟我們一起唱昆曲。不過先生唱曲子跟他做別的事一樣有自己獨特的風格，聽起來很象是在吟詩或讀書。一九四六年從昆明回到北京。我在城外清華工作，跟先生見面的機會就少了。文化革命中先生受的沖擊不小。偶爾輾轉聽到一點消息也不知道是真是假。那時我自顧不暇，沒有辦法去看望先生。文化大革命過去以後第一次見到先生是一九七二年在文物出版社召開的馬王堆一號墓座談會上。睽別將近十年，可是先生並不顯得老了多少，樂觀的態度也依然如故。那時先生剛從幹校回來不久。他在幾天之內就寫成了四萬多字考釋馬王堆一號墓遺冊的文章。正好我那時也跟裘錫圭同志合作考釋遺冊，我們一見面就大談遺冊裏的問題。盡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可是談得非常高興。那次座談會是在故宮洛德殿開的。散會以後我陪先生從西華門出來，先生告訴我他的《六國銅器》和《中國文字學》下冊的手稿都在抄家時丟失了。先生說完就哈哈大笑，似乎這種事在他心裏並不占多大分量的似的。

一九七五年春天文物出版社趕着要把馬王堆帛書甲乙兩本《老子》和卷前卷後佚書整理出版。當時參加整理工作的除了五廠先生外，還有張苑峰先生、裘錫圭同志和我。甲本《老子》殘損較乙本為多。定稿時貼照片的工作很繁重。因為要確定每一塊碎片的準確位置，同時還要做拼復工作，即把許多殘片根據文義和字迹拼合起來。由於時間緊迫，第二天必須完成，非開一晚上夜車不可。當時五廠先生說他可以承擔這項工作。我說：時間太緊，要開夜車。錫圭同志年輕，還是讓他去做吧。先生聽了，半晌不說話，我才發現先生說他願意做這個工作是非常認真的。先生當時的神情簡直有點象一

個原先說好要上什麼地方去玩兒臨時因為下雨去不成因此一肚子懊惱的孩子一樣。最後我們只好還是把這個工作交給先生去做。第二天一早先生就興沖沖地跑來了。照片全部貼好，而且還新拼上了許多碎片。可是他老先生却整日一個通宵沒有合眼。那一年先生已是七十五歲的高齡了。我想抱着功利的目的做學問的人大概是不會幹這種傻事的。先生年逾古稀，還有這樣的童心，實在令人感嘆。

先生天賦高，精力過於常人，興趣又十分廣泛，因此著述極富。不過其中有很多沒有完篇，有的只開了個頭就擱下了。先生自己也說：

余嗜欲既廣，易為環境所牽轉，往。削稿未半，已別肇端緒。又好為長篇鉅製，而多無成功。（《天壤閣甲骨文存·序》）

我和一兩位老同學偶爾談起先生，也總是為先生涉獵太廣不能集中精力把數十年來研究古文字的成果整理出來感到惋惜。一九七七年夏先生告訴我他已開始着手寫《殷虛文字綜述》和《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徵》兩部大書。我聽了非常高興，誰知不到兩年，先生就遽然逝去。這兩部重要著作終究未能完成。這無論對先生自己還是對後人來說，都是極大的憾事。

先生向來不以書家自居，但是他的字却很為人推重。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先生曾在昆明舉行過一次書法展覽。展品從甲骨金文到篆隸行楷，各種書體都有。先生的字不拘一格，興之所至，揮灑自如，雖不以功力見勝，却自有其意趣和風格。我沒有向書家求書的習慣，所以也沒有保存先生的墨迹。只是一九四五年在昆明結婚，先生為我證婚，曾以朱紅泥金箋書《蘭離》首章四句為贈。可惜這件紀念品竟毀於文化革命中。不過先生留下的手迹實在也不少。我知道的就有手抄故宮藏項跋本王韻和先

生為故宮藏全本《王仁煦刊謬補闕切韻》寫的長跋。此外，《古文字學專論》和《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也都是影印的手稿。先生的小楷秀麗遒勁。雖是文字學家，却不象清代小學家那樣以寫古字自炫，反而好寫俗字。每次翻閱這些書，面對先生手迹，想起先生生前音容笑貌，不禁悵然久之。

注 釋

- 一、《天壤閣甲骨文存》序：「甲骨之初發現歲為庚子。王氏（案指王懿榮）既以其年卒，余又適以是年生。」
- 二、《天壤閣甲骨文存》序：「……其後又好讀程、朱之書，更涉覽評籍與近人新著，所好彌廣矣。」

水調歌頭

一九六三年參加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
委員會擴大會議，十月十六日蒙國家領導人
接見全體人員，歸途喜賦。

深山定藏寶，大澤定多魚。六億人民起舞，今日
氣全舒。只為水深火熱，豈怕鍊金銷骨。塵埃
邊世休，振古所稀有，真為大丈夫。山河美，
人物盛，論雄圖。百慮同歸一政，新岸廟寤
途。不喜後生可畏，更望大千世界，雲雨通江
湖。馬列光芒遠，誰云時已殊。

參加五屆政協喜賦

七律一首

曾經風雨戰玄黃，
建設甘年籌共運，
夜鳴島鳥非世益，
征途萬里道方長。
活潑今朝亦緊張，
春放梅花且更香，
維往開來欣盛業，
神州九億浴陽光。

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

西周前期的文獻資料遺留下來的不很多，除了開國時事外，昭王南征，穆王周遊，都是大事，但在《尚書》中沒有記載。尤其是昭王兩次南征，喪師殞命，是很重要的。春秋時齊桓公曾以此向楚國問罪，戰國時楚國宗廟的壁畫裏有過描寫，所以屈原《天問》也提到了。魏國的《竹書紀年》記得比較清楚，應該是從晉國的史籍《晉之乘》裏遺留下來的。秦國呂不韋所集《呂氏春秋》也有較重要的記載。可見這段史實是東周時齊晉秦楚幾個大國中普遍傳播的。從宋代到現在，八百五十多年中，各地出土的青銅器銘刻中有很多是和這一件大事有關的，但是有些人却漠視這一事實，甚至連：過伯簋、猷鬲簋、燕簋等大多數人已經公認的昭王時器都要放到成王時去。一方面承認《南征》和《伐楚荆》等內容，和史書記載是相符合的，可是他還考慮再三，必須移此諸器于成王時代。（註一）這位作者不惜違反歷史事實來服從他的考慮，真可以作為唯心主義歷史學的最好標本。

從這裏可以看到離開歷史資料的分析，而來談論銅器斷代是此路不通的。我們現在對西周時代的青銅器銘刻，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資料，很可以把它們從其內在聯繫連貫起來，和文獻資料結合在一起來作全面的、綜合的研究，既以文獻資料來證明這

些地下發現的新資料，又回過來利用這些新資料來補充文獻資料的不足。現在是應該這樣來研究青銅器銘刻的時代了。一九三一年郭沫若同志撰《兩周金文辭大系》，根據生稱王號，根據由銘文內容能確定時代的若干標準器，兼及銅器形象，作劃分西周銅器時代的研究，為金文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途徑。這部劃時代的著作的問世，已經四十多年了。新中國建立，也已二十多年，隨着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新的考古資料不斷發現，很多資料是過去沒有想到的重要線索，我們應該及時對這些材料作一個初步的總結，來反映這個新的偉大的時代，並以利於進一步的探索。我們應該把大量的資料全部攤開，從其內在聯繫，從有關文獻記載，從出土地點，從器形、裝飾、圖案、文法、文字、書法等各方面的比較研究，去粗存精地作耐心地細緻的研究。當然，這樣的研究要多費一些氣力，但我總覺得為了使青銅器銘刻對西周歷史的研究有一些用處，這種方法是值得嘗試的。《國語》六記管仲對齊桓公說：「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對西周奴隸制王朝的這兩個王是很恭維的，這顯然代表周朝一些統治者的想法。昭穆兩代應該是西周文化最發達的時代，拿封建社會來比較，昭穆時代是相當於漢代的漢武帝、唐代的唐明皇和清代的乾隆，都是由極盛到衰落的轉變時期。後代史學家都受孔子的蒙蔽，像得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都是周公搞的，其實周公攝政只有七年，東征、作雒，一些大事還忙不過來，就算照今文家的說法攝政五年制禮作樂，兩三年裏面能搞多少東西。就算搞了一些，以後的成康昭穆能夠永遠照搬照抄沒有一些發展嗎？《呂刑》作於穆王時代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正由於孔子自命為繼承周公，就把成康昭穆幾乎都抹殺了。從青銅器銘刻來看，成王時代，銅器很多，但既沒有大器，也沒有長篇銘文，像大小孟鼎那樣幾百斤的重器，幾百

字的長銘，是康王末年才開始的，昭王時代有幾篇長銘是十分重要的史料。所以我先選擇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五十三篇來作這樣的嘗試。首先為它們作考釋，在考釋的基礎上再作綜合的研究。至於武王和成康時代青銅器的研究是不妨放在後一些的，把這個時代的銅器定下來之後，成康時代就容易解決了。

這裏選擇的五十三篇，是以南征伐楚荆等有十分明顯的証據的標準器為核心，就其有內在聯系的諸器銘彙集在一起的。凡是同銘的器，只作一篇；凡是同一氏族或同一人的器而銘詞簡短，沒有其它內容的只作為附錄；凡器形、圖案、文字、書法等有近似，可以定為這個時代而沒有明顯的聯系的，暫不收入。就是這樣，所錄五十三篇銘文就已經有六十五件銅器，加上同氏同人所作的器，就有上百件，在目前，這樣大量的資料，已經可以使我們從中看出一些問題來了。五十三篇的目次如下：

- 一作冊鬲
- 二 作冊令尊 作冊令方彝
- 三 因工簋（即魯侯簋）
- 四 旅鼎
- 五 叔卣一 叔卣二
- 六 不遷簋
- 七 泉伯卣
- 八 彘鼎
- 九 員卣
- 十 匏鼎